

社会流动感知：研究现状及未来方向^{*}

王雪¹ 卓悦民^{2,3} 杜洪飞^{2,3} 高海燕⁴ 史佳鑫^{**3}

(¹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5) (²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心理系, 珠海, 519087)

(³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⁴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124)

摘要 社会流动是指个体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早期文献主要关注客观社会流动, 而近年来研究发现, 主观社会流动感知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社会流动感知是指人们感知到的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变动的可能性。尽管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但国内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关注还相对较少, 且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介绍了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及其研究意义, 然后阐述了个体心理因素、人口学变量对社会流动感知的预测, 并总结社会流动感知对心理健康、社会态度和价值观、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从社会流动类型、前因、影响机制等三个方面, 指出现有研究的局限, 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 社会流动 经济流动 社会流动感知 社会阶层 社会公平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重要部署。实现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途径, 就是扩大劳动力、促进人才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 (social mobility) 是指个体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 (Chetty et al., 2014), 社会流动感知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是个体对客观社会流动的主观感知, 即人们感知到的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变动的可能性 (陈云松, 范晓光, 2016; 陈云松等, 2019; 张跃等, 2020; Day & Fiske, 2017; Du et al., 2021; Sagioglou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22, 2023)。

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客观社会流动水平 (Bian, 2002; Chetty et al., 2014), 近年来关于主观社会流

动感知的研究日益丰富, 并且发现社会流动感知对个体心理和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Alesina et al., 2018; Day & Fiske, 2019; Sagioglou et al., 2019)。然而, 目前国内对于社会流动感知的关注还相对较少, 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 因此本文基于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 对社会流动感知这一研究主题进行系统梳理和介绍。第1部分介绍了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和研究意义, 第2部分阐述了社会流动感知的预测因素, 第3部分介绍了社会流动感知的后效, 第4部分对现有研究在类型、影响因素、影响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局限进行了评述, 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文章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 本研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31042214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源稀缺对共享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稀缺双路径模型” (72402011)、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引进人才工作运行和科研启动项目 (312200502504)、国家社科基金“新发展阶段民众共同富裕心态和影响机制研究” (23BSH074) 的资助。

^{**} 通讯作者: 史佳鑫, E-mail: shijiaxin@bnu.edu.cn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40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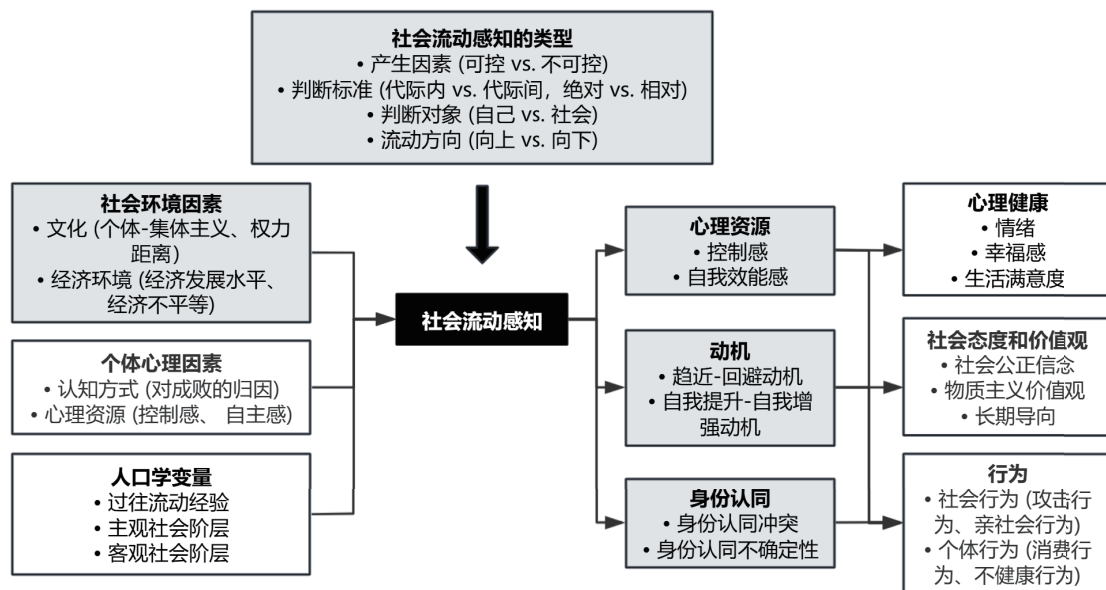


图1 本文理论框架

注：灰色内容为现有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展望。

1 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和研究意义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中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变动和迁移，它是衡量社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 (Torche, 2015)。社会流动可以进一步分为客观和主观两类，客观社会流动是指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发生的客观变动，其衡量指标为职业、教育、收入等的变化 (Chetty et al., 2014)。主观社会流动感知是指个体感知到的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变动的可能性 (Day & Fiske, 2017; Hays & Bendersky, 2015; Sagioglou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22, 2023)，它通常采用问卷的形式进行测量，例如让被试对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Chambers et al., 2015; Du et al., 2021; Kraus & Tan, 2015; Wang et al., 2020)。

与客观社会流动水平相比，近年来学界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关注日益增加，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在不同国家展开的研究均发现，社会流动感知和客观社会流动水平并不完全相同 (陈云松等, 2019; Davidai & Gilovich, 2015; Hsiao et al., 2020)。例如，美国人对于社会流动的估计往往高于国家公布的客观社会流动数据和国际排名水平 (Alesina et al., 2018; Kraus & Tan, 2015)，而法国、意大利、瑞

典和英国则容易低估社会流动水平 (Alesina et al., 2018)。这种人们对社会流动的感知偏差，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个体在估计社会流动水平时是基于自身经验和限定的社会比较 (陈云松等, 2019)，缺乏全面的客观信息 (Varnum, 2013)，还可能受到自我保护动机 (Kraus & Tan, 2015)、政治取向 (Chambers et al., 2015) 等因素的影响。其次，社会流动感知能够比客观流动水平更能准确地预测个体的心理和行为 (Alesina et al., 2018; Day & Fiske, 2019; Sagioglou et al., 2019)。例如，Mijs 等学者 (2022) 发现，主观社会流动感知而非客观社会流动水平预测了优绩主义信念。基于上述两个原因，现在学界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关注日益增加。

2 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因素

目前文献中关注过的能够预测社会流动感知的因素，可以分为个人心理因素和人口学变量两类。

2.1 个体心理因素

影响社会流动感知个体心理因素包括认知方式和心理资源。认知方式是指个体对于成败的归因。成败既可以被归因于外在不可控的因素 (如社会大环境)，也可以被归因于内在可控的因素 (如个人努力)。个体越倾向于外归因时，感知到的社会流

动水平越低。例如,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感知和社会流动感知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而这一关系正是受到了成败归因的中介作用(Davidai, 2018)。经济不平等(economic inequality)是指财富在社会不同阶层分配的不公平程度,高、低社会阶层的财富差距越大,经济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分别对应了社会的结果公平和程序公平,二者联系紧密。该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感知和社会流动感知的客观指标存在负相关,并且这一关系受到了成败归因的中介,感知到高经济不平等会促进人们对成败进行外归因,进而降低社会流动感知(Davidai, 2018)。

除了认知方式外,心理资源也会影响社会流动感知,主要包括控制感和自主感。Wang等学者(2020)发现,提升对自己外表的控制感可以增强女性的社会流动感知,但是并不会影响男性的社会流动感知,这可能是因为外表吸引力对于女性社会流动比男性更为重要。Ritterman Weintraub等学者(2015)针对墨西哥青少年的研究也发现,控制感和自主感这两个变量对该群体社会流动感知的预测作用最强。还有研究发现,当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不断加深的时候,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会使人们相信自己的经济状况也有机会得到改善,从而增强对社会流动的控制感,并对自身的社会流动产生积极预期(Hirschman & Rothschild, 1973)。

2.2 人口学变量

除了心理因素外,人口学变量也可以预测社会流动感知,主要包括过往流动经验、主观社会阶层和客观社会阶层。首先,个体过往经验会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研究发现个体常常根据自己过去的社会流动经验判断整个社会的流动水平(Day & Fiske, 2017)。例如,美国第一代移民会高估整个社会的流动水平,这是因为他们的起点较低,因此往往会经历向上流动,当他们在判断社会的流动水平时,也会从个人经验出发,感知到较高的社会流动(Alesina et al., 2018; Escobar, 2006)。值得注意的是, Du等学者(2021)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并未发现过去的社会流动经验影响未来的社会流动预期,不论这些被调查者过去经历向上社会流动的程度如何,他们都倾向于相信自己未

来会经历向上社会流动。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Alesina 等学者(2018)关注了被试对社会整体流动水平的感知,而 Du 等学者(2021)关注了个体自身流动水平的感知。研究发现,当社会流动感知的对象与自己的越相关时,他们越会高估社会流动水平(Hanson & Zogby, 2010; Kraus & Tan, 2015)。因此,在 Du 等学者(2021)的研究中,个体对自己未来社会流动的乐观预期,可能削弱了过去流动经验的影响,从而得到和之前研究不同的结论。

另外,社会阶层也会预测社会流动感知。社会阶层(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指依照社会经济财富状况将人们区分而成的不同群体(郭永玉等, 2015; 杨沈龙等, 2020; Barker, 2003),包括主观和客观两类。主观社会阶层(subjective SES)是个体感知到的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Adler et al., 2000; Cheon & Hong, 2017),通常使用社会阶梯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将社会的等级由低到高进行排序,个体按照对自己所处社会位置的估计,在阶梯上选择相应的数字(Kraus & Keltner, 2013; Wang et al., 2021)。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正向预测社会流动感知,即人们感知到自己的社会阶层越高,就越相信阶层是流动的(Kraus & Tan, 2015; Li, Yang, et al., 2020)。

相对于主观社会阶层而言,客观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感知的关系则较为复杂。客观社会阶层是指依据可量化的社会和经济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层次的系统。这些标准通常包括职业、收入、教育水平、财富和社会地位等(郭永玉等, 2015; 杨沈龙等, 2020; Kraus & Keltner, 2013)。基于中国被试的研究发现,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对社会流动感知的预测并不显著(Li, Yang, et al., 2020)。而基于美国被试的研究发现,收入水平正向预测社会流动感知,教育水平、职业负向预测社会流动感知(Kraus & Tan, 2015)。

3 社会流动感知的心理和行为效应

社会流动感知的后续心理和行为效应,主要包括心理健康、社会态度和价值观、行为三个方面。

3.1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社会流动感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情绪、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三个方面。尽管研究发现,感知到高社会流动反而会让个体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不确定感,进而带来压力和抑郁情绪(Kim et al., 2023)。但感知到高社会流动也可以促进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Bjørnskov et al., 2013; Gugushvili, 2022; Huang et al., 2017; Li et al., 2020; Lin et al., 2022)。例如,基于中国的大范围调查及实验研究发现,感知到高社会流动性可以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且这一关系在高、低社会阶层中均成立(Li et al., 2020)。针对中国北京城市移民(即在北京工作,却未持有北京户口的个体)的调查发现,高社会阶层正向预测该群体的幸福感,但这一关系只在感知到高社会流动的个体中成立(Huang et al., 2017)。此外,针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发现,高社会流动感知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是通过提升个体追求自我成长、意义感、社会贡献的动机而产生作用(Lin et al., 2022)。基于西方被试或者跨国数据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Bjørnskov et al., 2013; Gugushvili et al., 2022)。

3.2 对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

社会流动感知对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主要包括对社会公正信念、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基于中西方被试的研究发现,高社会流动感知会正向预测系统合理化信念(Li, Yang, et al., 2020),通过实验方法增强社会流动感知可以提升被试的系统合理化信念(Day & Fisk, 2017)。类似地,高社会流动感知还会正向预测对不公平的容忍程度,这种容忍程度也与系统合理化信念联系紧密(Benabou & Ok, 2001; Heiserman et al., 2020; Mandisodza et al., 2006; Wakslak et al., 2007)。高社会流动感知和系统合理化信念的关系可能通过两个路径实现(Shariff et al., 2016):一方面高社会流动感知给人们带来向上流动的希望,让其更能容忍当下的不公;另一方面高社会流动感知意味着社会具有程序公平,因此人们感知到高社会流动时更可能将社会的不公平归因于个体而非环境因素(如将贫穷归因于懒惰),从而更加合理化现有制度、容忍当下的不公。

除了社会价值观外,研究也开始关注到社会流动感知对个体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社会

流动感知可能会让个体对自身社会地位产生不确定感,从而提升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Wang et al., 2022)。另外,社会流动感知还会影响个体的长期导向。研究发现持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在感知到高社会流动性时,反而会减少冲动消费,以实现长远的财务目标(Yoon & Kim, 2016)。还有研究发现,当人们感知到高社会流动时,他们会对未来表现出积极预期,更可能把时间资源分配到个人发展上并降低生育意愿(Wang et al., 2023)。这些结果都表明,高社会流动感知会促进长期导向。

3.3 对行为的影响

社会流动感知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具体包括社会行为(攻击行为、亲社会行为)和个体行为(消费行为、不健康行为)。

社会行为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表现出的行为,研究发现高社会流动性可以促进一系列积极的社会行为,包括减少攻击行为、促进亲社会行为(Kwon & Yi, 2019; Rao et al., 2022; Ritterman Weintraub et al., 2015; Sagioglou et al., 2019)。并且高社会流动感知对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在低社会阶层中更强(Kwon & Yi, 2019; Sagioglou et al., 2019),这或许是因为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个体感到更强的相对被剥夺感(Wang et al., 2021),而提升社会流动感知能够减少相对被剥夺感,从而削弱上述效应(Rao et al., 2022; Sagioglou et al., 2019)。

除了社会行为外,研究还开始关注社会流动感知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包括消费行为和不健康行为。消费领域的研究发现,感知到低社会流动会减少个体的控制感,这会促使消费者选择多样化的产品作为对低控制感的补偿(Yoon & Kim, 2018)。还有研究发现,对社会流动的感知会影响家长的消费选择(Chen et al., 2024)。感知到高社会流动会提升家长的地位促进目标(status advancement goal),进而让他们更愿意购买增进孩子长处的商品;而感知到低社会流动会提升家长的地位维持目标(status maintenance goal),进而让他们更愿意购买弥补孩子短处的商品(Chen et al., 2024)。还有研究低社会流动感知会带来不健康行为,如饮酒、吃不健康食品等(Ritterman Weintraub et al., 2015)。

4 局限与展望

上文通过梳理多个领域的相关研究,介绍了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意义、前因、后效,本部分将从三个方面阐述现有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研究展望。首先,现有研究很少区分不同类型的社会流动,这会给相关实证研究带来偏差。其次,在前因部分,现有研究忽略了社会环境因素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最后,在后效部分,现有研究多为独立展开,很少系统探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构建相关理论体系。

4.1 未厘清社会流动感知的分类

(1) 按照社会流动的产生因素分类:可控 vs. 不可控因素

如前文所述,社会流动是指个体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这种变动既可能受到外部不可控因素(如社会动荡、经济发展、运气)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内部可控因素(如个人努力)的影响。然而,在研究中很少明确自己关注的是哪类社会流动。一些学者认为,对于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应该限定在可控因素相关的流动中(Sagioglou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22; Yoon & Kim, 2016)。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流动就是社会阶层变动的可能性,而将阶层变动归因于内在因素是高社会流动感知的后续效应(Davidai & Gilovich, 2015; Day & Fiske, 2017)。还有一些学者区分了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阶层可变信念(growth mindset of SES; Zhao, Chen, et al., 2021; Zhao, Du, et al., 2021),后者是指人们对社会阶层是否可变的认知,高可变性信念可能带来高社会流动感知,但该观点同样未明确关注了哪类社会流动感知。

本文建议未来研究采用第一种处理方式,即关注个体感知到的、能够通过努力改变社会阶层的可

能性。这是因为由可控因素主导的社会流动,才能更好地反映人们对于社会流动的朴素理解,贴近现实情况。中国在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也在人们心中植入了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因此社会流动也是“中国梦”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重要路径。

(2) 按照社会流动的判断标准分类:代际内 vs. 代际间,绝对 vs. 相对

除了按照产生因素进行分类外,社会流动还可以判断标准进行分类。判断标准又包括两个维度:参照点和衡量指标(盛智明, 2013; Davidai & Wienk, 2021; 见图2)。参照点是指判断社会流动水平时的参照对象,既可以是个体过往经历,也可以是父辈或原生家庭。将个体当下的社会阶层和其过往经历进行对比,就是代际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将个体当下的社会阶层和其父辈或原生家庭进行对比,就是代际间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另外,在对比过程中的衡量指标也可以分为绝对(如绝对收入水平)、相对(如收入所在的百分位)两类,采用前者得到的是绝对流动(absolute mobility),采用后者得到的是相对流动(relative mobility)。根据参照点、衡量指标的不同,可以得到四类社会流动:绝对代际间流动(absolut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相对代际间流动(relativ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绝对代际内流动(absolute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相对代际内流动(relative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以往关于客观社会流动的研究会清晰阐明它们采用何种参照点和衡量指标,但是关于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却常常没有明确标准。例如,在问卷调查中,被试只需要笼统地报告自己感受到的社会流动高低,或者报告自己是否同意社会阶层是流动的。

		参 照 点	
		自 己	父 辈 或 原 生 家 庭
衡 量 指 标	绝对财富、收入	绝对代际内流动	绝对代际间流动
	相对社会位置	相对代际内流动	相对代际间流动

图2 社会流动的判断标准

如 Sagioglou 等学者 (2019) 使用的测量题目为“你是否同意社会地位是高度灵活的?” (Do you agree that social status is something that is highly flexible?), 但是被试判断的参照点和衡量标准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因此就不清楚被试到底感知到了哪类社会流动。

而明确具体关注哪类社会流动非常必要。一方面, 个体对于四类社会流动的感知可能存在差异 (Shariff et al., 2016)。以中国为例,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大部分人的绝对收入增加了, 即感知到绝对的向上流动 (Zang & de Graaf, 2016); 然而, 在经济腾飞的同时,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个体在社会中的相对收入位置可能反而降低了, 从而体会到了相对的向下流动 (Du et al., 2021)。另一方面对于四类社会流动的感知可能带来不同效应。例如, 相对流动感知对于公平感、被剥夺感的影响应该大于绝对流动感知 (张跃等, 2020; Day & Fiske, 2019; Du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2)。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 如果研究者在测量或操纵社会流动感知时不明确具体类型, 则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 未来研究不能笼统地测量或操纵社会流动感知, 而是要明确判断社会流动的具体标准 (Davidai & Wienk, 2021; Mérola & Helgason, 2016)。

(3) 按照社会流动的判断对象分类: 关于自己 vs. 关于社会

社会流动感知还可以根据判断对象进行分类。人们在感知社会流动水平时, 对象既可能是自己或相关群体, 也可能是一般他人或者社会的整体水平。现有研究在测量或操纵社会流动感知时, 很少明确区分感知对象。而感知对象的不同, 会影响社会流动感知中乐观偏差的程度 (Davidai & Gilovich, 2015; Kraus & Tan, 2015)。

研究发现, 当个体评价一个社会的流动性水平时候, 他们会高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低估向下流动的可能性, 从而表现出乐观偏差 (Davidai & Gilovich, 2015)。并且, 当社会流动感知的对象与自己的相关性越高时, 乐观偏差效应越强 (Hanson & Zogby, 2010; Kraus & Tan, 2015)。例如, 有研究发现, 被试评价跟自己情况类似的群体的社会

流动情况时, 更可能高估流动水平 (Kraus & Tan, 2015)。在自我相关的社会流动感知中的乐观偏差现象在中国和欧洲也有类似的发现 (Du et al., 2021; Kelley & Kelley, 2009)。人们之所以高估自身或者相关群体的社会流动水平, 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平信念, 也可能出于自我增强动机 (张跃等, 2020; Kraus & Tan, 2015)。

(4) 按照社会流动的方向分类: 向上 vs. 向下流动

社会流动还可以进行方向上的区分, 包括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但是研究发现, 人们在进行社会流动感知的判断时, 主要考虑向上流动 (Mandisodza et al., 2006), 例如当被试论述社会流动的定义时, 只有 31% 的被试同时考虑到向上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 而有 40% 的被试仅考虑了向上流动 (Mandisodza et al., 2006)。还有研究让被试分别估计能够进行相对向上流动和相对向下流动的人群比例, 发现二者的相关很低, 说明人们并未同时考虑两个流动方向 (Browman et al., 2022)。

不仅一般大众在感知社会流动时主要考虑向上流动, 研究者也存在这样的倾向 (Bjørnskov et al., 2013; Davidai, 2018; Hsiao et al., 2020; Swan et al., 2017; Yoon & Kim, 2016, 2018)。例如研究者在操纵社会流动感知时, 先告知被试: “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 (Everyone has a fair chance at moving up the economic ladder), 然后让社会流动感知高、低两组被试分别写出理由支持或反对这个观点 (Yoon & Kim, 2016, 2018), 这种操纵方式实质上只改变了被试的向上社会流动感知。

不同方向的社会流动感知会带来不同的心理效应。例如, 研究发现感知到相对向上流动会让人们反对财富再分配, 而感知到相对向下流动会让人们支持财富再分配 (Mérola & Helgason, 2016)。还有研究发现, 被试如果同时考虑到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 会感觉到对自身社会阶层的不确定性, 从而补偿性地追求物质主义 (Wang et al., 2022)。

综上所述, 社会流动的具体类型不仅会影响人们感知到的社会流动水平, 进而还会影响其后效。因此未来研究在问题提出、材料设计等环节, 都应明确自己所关注的社会流动类型, 避免出现研究结

果的偏差。

4.2 拓展社会环境因素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

从第2部分可以看到,目前对于社会流动感知前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层面,很少关注宏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着重拓展两类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文化和经济环境。

(1) 拓展文化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它塑造了个体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已有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社会流动感知存在差异,与客观流动水平相比,美国人倾向于高估社会流动,而法国、瑞典等欧洲国家的民众则会低估社会流动(Alesina & Stantcheva, 2019; Alesina et al., 2018),这意味着文化也可能影响社会流动感知。

首先是个体-集体主义文化(individualistic-collectivist culture)可能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研究的确发现,在个体主义文化中长大的孩子,未来更可能出现客观地向上社会流动(Leonard & Smith, 2021)。个体-集体主义文化也可能影响社会流动感知,在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人独立和自我实现,人们更可能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个人努力和能力;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群体和谐和共同目标,个体的成就通常被看作是群体支持和合作的结果(Singelis & Brown, 1995)。因此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人们可能感知到更高的社会流动,未来研究可以检验这一可能性。

其次,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也可能影响社会流动感知。权力距离是指一个社会对于权力在组织和机构中分配不均的接受程度和期望。权力距离越大,人们对于不同阶层之间权力分配的差距的接受程度越高。研究发现,在权力距离越大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把社会流动归因于不可控的因素,如种族、社会关系(Reyes, 2018)。根据这一结果可以推论,权力距离越大,个体的社会流动感知越低。

(2) 拓展经济环境因素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

除了文化因素,经济环境也是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重要变量,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不平等水平两方面,并且二者还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个体的发展机会更多,人们更可能感受到高社会流动性。相反在经济不景

气的情况下,个体发展机会受限,更可能感受到低社会流动性。但是目前尚未有研究直接指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流动感知的关系,这或许与经济不平等的干扰作用有关(Ugur, 2021)。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高、低社会阶层的财富差距也可能进一步拉大,促进了经济不平等现象,从而降低了社会流动感知(Ugur, 2021)。未来研究可以系统探索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不平等如何交互影响社会流动感知。

4.3 厘清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机制

在第3部分,我们梳理了社会流动感知对心理健康、社会态度和价值观、行为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相互独立,缺乏整合性的理论框架来理解社会流动感知的效应。我们提出社会流动感知主要通过心理资源、动机、身份认同三个路径,产生后续效应。

(1) 社会流动感知对心理资源的影响

心理资源不仅能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社会流动感知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心理资源,包括控制感和自我效能感。前文提到,低社会流动感知会削弱控制感,进而促进补偿消费(Yoon & Kim, 2018)。Ritterman Weintraub等人(2015)在关注低社会流动感知带来的不健康行为时,也发现它会降低控制感,虽然作者没有进一步检验控制感在社会流动感知和不健康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是这一关系在理论可能成立,值得未来研究探索。

另外,社会流动感知也可能影响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即个体对自己能够成功完成某一特定任务或达到某一目标的信心和信念。虽然目前尚未有研究直接检验社会流动感知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但是间接证据支持了它们的关系。自我效能感对学业表现非常重要(Honick & Broadbent, 2016),而研究发现感知到高社会流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坚持性,并且获得更好的学业表现(Browman et al., 2022)。未来研究可以探索社会流动感知如何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学业以外的行为表现。

(2) 社会流动感知对动机的影响

此外,社会流动感知还可能通过影响动机,带来后续效应。趋近-回避(approach-avoidance)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组动机,也是成就目标理论(achievement goal theory; Dweck, 1986)、调节定向

理论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Higgins, 1997) 等经典动机理论中所关注的动机维度。趋近动机是靠近一个理想的对象、情境或者目标的动机, 回避动机是远离不理想的对象、情境或者目标的动机 (Elliot, 2006)。

虽然目前尚未有研究关注过社会流动感知如何影响趋近 - 回避动机, 但是关于社会流动感知效应的研究, 暗示着它们可能存在联系。例如前文提到, 感知到高社会流动会提升地位促进目标, 感知到低社会流动会提升家长的地位维持目标 (Chen et al., 2024)。而地位促进目标和趋近动机一致, 地位维持目标和回避动机一致。另外前文提到, 当人们感知到高社会流动时, 会追求长远的财务目标、个人发展, 降低生育的意愿 (Wang et al., 2023; Yoon & Kim, 2016), 这也与趋近动机一致。因此, 上述文献表明, 高社会流动感知可能激发趋近动机, 而低社会流动感知可能激发回避动机, 未来研究可以探索这一可能性。

另外, 社会流动感知也可能影响自我提升动机 (self-improvement motivation) 和自我增强动机 (self-enhancement motivation), 前者是指个体主动寻求能够实现个人进步、成长、提升的动机 (丁瑛, 钟嘉琦, 2020; Allard & White, 2015), 后者是指个体保持积极的自我认知的动机 (Alicke & Sedikides, 2009)。以往研究发现, 感知到高社会流动会提高个体的目标坚持 (Bernardo et al., 2018)、对孩子教育投入 (Zhang et al., 2020)、对孩子教育的期许 (Ng et al., 2017) 以及个体的学业成就 (Zhao, Chen et al., 2021), 这些都是自我提升动机的表现 (Davidai & Wienk, 2021; Day & Fiske, 2019; Jia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3)。而社会流动感知和自我增强动机的关系则很少被关注。自我增强动机往往出现在个体受到威胁、遭遇失败和自尊心被打击的情况下 (Berger & Iyengar, 2013; Chatterjee et al., 2013), 人们通过防御性行为来提升积极自我评价、避免消极评价, 如偏差性地处理信息、避免暴露缺点以及维持不切实际的个人感知 (Sedikides & Strube, 1997)。一方面, 低社会流动感知可能降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概念, 从而提升自我增强动机; 另一方面, 高社会流动感知会让个体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不确定性

(Wang et al., 2022), 因而也可能动摇个体自我概念的稳定性, 提升自我增强动机。未来研究可以检验社会流动感知对两类动机的影响。

(3) 社会流动感知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身份认同也可能是社会流动感知效应的机制, 包括身份认同冲突和身份认同不确定性。研究发现, 经历了向上流动的个体, 会在过往经历和当下境遇之间感受到身份认同冲突, 因此幸福感更低 (Rheinschmidt & Mendoza-Denton, 2014; Stephens et al., 2019)。例如, 基于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 虽然来自低社会阶层的大学生通过教育实现了向上流动, 但是他们相比于那些高社会阶层背景的大学生, 更可能出现适应问题, 体验到更多的负面情绪, 甚至出现药物滥用等问题; 但是如果让这些学生意识到社会流动对他们的影响, 这种负面效应可能会得到缓解 (Chen et al., 2015; Stephens et al., 2012)。虽然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个体真实的流动经历, 但是未来研究可以探索社会流动感知是否会带来类似的效应。

另外, 社会流动感知还可能影响身份认同不确定性。前文提到, 感知到高社会流动, 会让个体对自身社会阶层产生不确定性, 进而带来物质主义、压力、抑郁等负面效应 (Kim et al., 2023; Wang et al., 2022)。这些研究只关注了与社会阶层相关的身份认同,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社会流动感知是否也会对一般性的自我概念带来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在哪些群体中效应更强, 如社会地位焦虑越高的群体是否效应越强 (Layte & Whelan, 2014)。

参考文献

- 陈云松, 范晓光. (2016). 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 (2003—2013). *中国社会科学*, 12, 109-126, 206-207.
- 陈云松, 贺光烨, 句国栋. (2019). 无关的流动感知: 中国社会“阶层固化”了吗? *社会学评论*, 7(6), 49-67.
- 丁瑛, 钟嘉琦. (2020). 社会拥挤对自我提升类产品偏好的影响. *心理学报*, 52(2), 216-228.
- 郭永玉, 杨沈龙, 李静, 胡小勇. (2015).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3(8), 1299-1311.
- 盛智明. (2013). 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基于 CGSS2006 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 33(4), 35-59.
- 杨沈龙, 喻丰, 胡小勇, 郭永玉. (2020). 心理学研究中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及其衍生问题. *心理科学*, 43(2), 505-511.
- 张跃, 郭永玉, 丁毅. (2020). 经济不平等对阶层流动感知的影响及其机制. *心理科学*, 43(5), 1197-1203.

- Adler, N. E., Epel, E. S., Castellazzo, G., & Ickovics, J. R. (2000).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19*(6), 586–592.
- Alesina, A., & Stantcheva, S. (2019). *Mobility: Real and perceived*.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stantcheva/files/city_journal_alesina_stantcheva.pdf
- Alesina, A., Stantcheva, S., & Teso, E. (2018).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2), 521–554.
- Alicke, M. D., & Sedikides, C. (2009). Self-enhancement and self-protection: What they are and what they do.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 1–48.
- Allard, T., & White, K. (2015). Cross-domain effects of guilt on desire for self-improvement product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2*(3), 401–419.
- Barker, C. (2003).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SAGE Publications.
- Benabou, R., & Ok, E. A. (2001).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demand for redistribution: The poum hypothesi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2), 447–487.
- Berger, J., & Iyengar, R. (2013).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word of mouth: How the medium shapes the messag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0*(3), 567–579.
- Bernardo, A. B. I., Clemente, J. A. R., & Wang, T. Y. (2018). Working for a better future: Social mobility beliefs and expectations of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in Macau.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70*(4), 350–360.
- Bian, Y. J. (2002).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91–116.
- Bjørnskov, C., Dreher, A., Fischer, J. A. V., Schnellenbach, J., & Gehring, K. (2013).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When perceived social mobility and economic reality do not match.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91*, 75–92.
- Browman, A. S., Destin, M., & Miele, D. B. (2022). Perception of economic inequality weakens Americans' beliefs in both upward and downward socioeconomic mobility.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5*(1), 35–51.
- Browman, A. S., Svoboda, R. C., & Destin, M. (2022). A belief in socioeconomic mobilit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ally motivating identities among low-socioeconomic status youth. *Self and Identity, 21*(1), 42–60.
- Chambers, J. R., Swan, L. K., & Heesacker, M. (2015). Perceptions of U.S. social mobility are divided (and distorted) along ideological lin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4), 413–423.
- Chatterjee, P., Irmak, C., & Rose, R. L. (2013). The endowment effect as self-enhancement in response to threa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0*(3), 460–476.
- Chen, E., Miller, G. E., Brody, G. H., & Lei, M. (2015). Neighborhood poverty, college attendance, and diverging profiles of substance use and allostatic load in rural African American youth.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3*(5), 675–685.
- Chen, Q. H., Wang, Y. J., & Zhang, Y. (2024). Developing strengths or remedying weaknesses? How perceived social mobility affects parents' purchase preference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al products. *Journal of Marketing*.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Cheon, B. K., & Hong, Y. Y. (2017). Mere experience of low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timulates appetite and food intak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1), 72–77.
- Chetty, R., Hendren, N., Kline, P., Saez, E., & Turner, N. (2014).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5), 141–147.
- Davidai, S. (2018). Why do Americans believe in economic mobility? Economic inequality, external attributions of wealth and poverty, and the belief in economic mobi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9*, 138–148.
- Davidai, S., & Gilovich, T. (2015). Building a more mobile America – One income quintile at a tim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1), 60–71.
- Davidai, S., & Wienk, M. N. A. (2021). The psychology of lay beliefs about economic mobility.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5*(8), Article e12625.
- Day, M. V., & Fiske, S. T. (2017). Movin' on up? How perce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affect our willingness to defend the system.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8*(3), 267–274.
- Day, M. V., & Fiske, S. T. (2019).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bility beliefs. In J. Jetten, & K. Peters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equality* (pp. 365–380). Springer.
- Du, H. F., Liang, Y., Chi, P. L., & King, R. B. (2021). Chinese perceive upward social mobility: How future mobility is influenced, but not limited by past mo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6*(6), 951–960.
- Dweck, C. S. (1986). Motivational processes affecting lear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10), 1040–1048.
- Elliot, A. J. (2006).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approach-avoidance motiva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0*, 111–116.
- Escobar, G. (2006). *The optimistic immigrant*. <https://www.pewresearch.org/2006/05/30/the-optimistic-immigrant/>
- Gugushvili, A., Zelinska, O., Präg, P., & Bulczak, G. (2022). Does perceived social mobility affect health? Evidence from a fixed effects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94*, Article 114705.
- Hanson, S. L., & Zogby, J. (2010). The polls—Trends: Attitudes about the American dream.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4*(3), 570–584.
- Hays, N. A., & Bendersky, C. (2015). Not all inequality is created equal: Effects of status versus power hierarchies on competition for upward mo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67–882.
- Heiserman, N., Simpson, B., & Willer, R. (2020). Judgments of economic fairness are based more on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than perceived inequality. *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 6*, Article 2378023120959547.
- Higgins, E. T. (1997). Beyond pleasure and pai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12), 1280–1300.
- Hirschman, A. O., & Rothschild, M. (1973). 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4), 544–566.
- Honicke, T., & Broadbent, J. (2016).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 systematic review.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17*, 63–84.
- Hsiao, H. H. M., Wong, K., Wan, P. S., & Zheng, V. (2020). The impact of

-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young peopl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5(4), 319–336.
- Huang, S. L., Hou, J. W., Sun, L., Dou, D. H., Liu, X., & Zhang, H. C. (2017). The effects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ubjective social mobi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Article 819.
- Jia, L. L., Lim, C. H., Ismail, I., & Tan, Y. C. (2021). Stunted upward mobility in a learning environment reduces the academic benefits of growth mindse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8(10), Article e2011832118.
- Kelley, S. M. C., & Kelley, C. G. E. (2009). Subjective social mobility: Data from thirty nations. In M. Haller, R. Jowell, & T. W. Smith (Eds.),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1984–2009* (pp. 106–124). Routledge.
- Kim, T., Shein, B., Joy, E. E., Murphy, P. K., & Allan, B. A. (2023). The myth of social mobility: Subjective social mobility and mental health.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51(3), 395–421.
- Kraus, M. W., & Keltner, D. (2013). Social class rank, essentialism, and punitive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2), 247–261.
- Kraus, M. W., & Tan, J. J. X. (2015). Americans overestimate social class mobi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8, 101–111.
- Kwon, Y., & Yi, Y. (2019).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on customer aggression toward service employees: A darker aspect of customer behavior.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36(11), 1120–1132.
- Layte, R., & Whelan, C. T. (2014). Who feels inferior? A test of the status anxiety hypothesis of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ealth.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4), 525–535.
- Leonard, B., & Smith, S. M. (2021).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increases economic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8(37), Article e2107273118.
- Li, W. Q., Wu, J. H., & Kou, Y. (2020). System justification enhances life satisfaction of high- and low-status people in Chin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1(5), 588–596.
- Li, W. Q., Yang, Y., Wu, J. H., & Kou, Y. (2020). Testing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 in China: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divergently predict system jus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6(7), 1044–1058.
- Lin, L., Hua, L. Y., & Li, J. G. (2022). Seeking pleasure or growth? The mediating role of happiness motives in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obility beliefs and well-being in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4, Article 111170.
- Mandisodza, A. N., Jost, J. T., & Unzueta, M. M. (2006). “Tall poppies” and “American dreams”: Reactions to rich and poor i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7(6), 659–668.
- Mérola, V., & Helgason, A. F. (2016). Are we in the same boat or not? The opposite effects of absolute and relative income shifts on redistributive prefere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8(4), 1107–1123.
- Mijs, J. J. B., Daenekindt, S., de Koster, W., & van der Waal, J. (2022). Belief in meritocracy reexamined: Scrutinizing the role of subjective social mobilit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85(2), 131–141.
- Ng, F. F. Y., Sze, I. N. L., Tamis-LeMonda, C. S., & Ruble, D. N. (2017). Immigrant Chinese mothers' socialization of achievement in children: A strategic adaptation to the host society. *Child Development*, 88(3), 979–995.
- Rao, T. T., Yang, S. L., Yu, F., Xu, B. X., & Wei, J. (2022). Perception of class mobil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ur.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5(1), 88–102.
- Reyes, M. L. (2018). Social mobility attributions i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cultures: Power distance and individualism as moderators of self-attribution bias.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2, Article e9.
- Rheinschmidt, M. L., & Mendoza-Denton, R. (2014). Social clas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ollege: The interplay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entity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7(1), 101–121.
- Ritterman Weintraub, M. L., Fernald, L. C. H., Adler, N., Bertozzi, S., & Syme, S. L. (2015). Perce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Development of a new psychosocial indicator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risk behaviors.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3, Article 62.
- Sagioglou, C., Forstmann, M., & Greitemeyer, T. (2019). Belief in social mobility mitigates hostility resulting from disadvantaged social stand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5(4), 541–556.
- Sedikides, C., & Strube, M. J. (1997). Self-evaluation: To thine own self be good, to thine own self be sure,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to thine own self be better.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9, 209–269.
- Shariff, A. F., Wiwad, D., & Akinin, L. B. (2016). Income mobility breeds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Cross-n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3), 373–380.
- Singelis, T. M., & Brown, W. J. (1995). Culture, self, and collectivist communication: Linking culture to individual behavior.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3), 354–389.
- Stephens, N. M., Fryberg, S. A., Markus, H. R., Johnson, C. S., & Covarrubias, R. (2012). Unseen disadvantage: How American universities' focus on independence undermines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6), 1178–1197.
- Stephens, N. M., Townsend, S. S. M., & Dittmann, A. G. (2019). Social-class dispar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workplaces: The role of cultural mismatch.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 67–73.
- Swan, L. K., Chambers, J. R., Heesacker, M., & Nero, S. S. (2017). How should we measure Americans' perceptions of socio-economic mobility?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12(5), 507–515.
- Torche, F. (2015). Analyse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57(1), 37–62.
- Ugur, Z. B. (2021). How does inequality hampe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ole of fairnes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58(2), 377–407.
- Varnum, M. E. W. (2013). What are lay theories of social class? *PLoS ONE*, 8(7), Article e70589.
- Wakslak, C. J., Jost, J. T., Tyler, T. R., & Chen, E. S. (2007). Moral outrage mediates the dampening effect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on support for

- redistributive social polici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3), 267–274.
- Wang, X., Chen, W. F., Hong, Y. Y., & Chen, Z. S. (2022). Perceiving high social mobility breeds materialism: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uncertaint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39, 629–638.
- Wang, X., Chen, Z. S., Poon, K. T., & Jiang, T. L. (2021). Perceiving a lack of social justice: Lower class individuals apply higher moral standards to other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2(2), 186–193.
- Wang, X., Teng, F., Chen, Z. S., & Poon, K. T. (2020). Control my appearance, control my social standing: Appearance control beliefs influence American women' s (not men' s)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5, Article 109629.
- Wang, X. J., Wang, X., & Chen, Z. S. (2023). High social mobility leads to delayed reproductio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52(4), 1365–1377.
- Yoon, S., & Kim, H. C. (2016). Keeping the American dream ali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and materialism on impulsive spend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53(5), 759–772.
- Yoon, S., & Kim, H. C. (2018). Feeling economically stuck: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variety seek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4(5), 1141–1156.
- Zang, E., & de Graaf, N. D. (2016). Frustrated achievers or satisfied losers? Inter- and intra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nd happiness in China. *Sociological Science*, 3(33), 779–800.
- Zhang, F., Jiang, Y., Ming, H., Yang, C. Y., & Huang, S. L. (2020).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dolesc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subjective social mobility and attent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9(9), 1821–1834.
- Zhao, S., Chen, L. H., King, R. B., Nie, Y. G., Du, H. F., & Chi, P. L. (2021). When adolescents believe that SES can be changed, they achieve more: The role of growth mindset of S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3, Article 111104.
- Zhao, S., Du, H. F., Li, Q. F., Wu, Q. L., & Chi, P. L. (2021). Growth mindse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boos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68, Article 110301.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Progress and Future Directions

Wang Xue¹, Zhuo Yuemin^{2,3}, Du Hongfei^{2,3}, Gao Haiyan⁴, Shi Jiaxin³

(¹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²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519087)

(³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⁴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Abstract Social mobility refers to the movement of individuals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hierarchies. Early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mainly focused on objective social mobility. However, accumulating studies suggest that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refers to the perceived possibility of movement or 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or strata within a society. This review aims to highlight recent advance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and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Integrating research from several fields, the authors first introduce the definition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of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They then explain how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e.g., cognitive style and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e.g., social mobility experience,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predict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They then present the downstream effects of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on mental health (e.g., emotions, well-be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social attitudes and values (e.g., belief in social justice, materialism, and long-term orientation), and behaviors (e.g., interpersonal and intrapersonal behaviors).

Next,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literature and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First, existing research overlooks the specific types of social mobility. There are four criteria to clarify social mobility. Based on the factors causing social mobilit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mobility due to controllable factors and mobility due to uncontrollable factors. The authors suggest following the first approach because it aligns more closely with people's lay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Social mobility can also be classified based on different reference points and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bsolut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relativ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bsolute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relative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judgment object, social mobility can be divided into personal and societa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exhibit optimistic bias when the estimation objects are more relevant to them. Based on direction, social mobility can be divided into upward and downward. However, when people think about social mobility, they tend to consider upward mobility, which is true for researchers as well. Current research often confuses these types, which may lead to inconsistent research findings.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learly specify the type of social mobility being studied.

Second,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future research can expand on how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On the one hand, it is possibl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factors. For example, individualistic versus collectivistic cultures might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individualistic cultures, which emphasize personal independence and self-actualization, individuals are more likely to attribute success to personal effort and ability. In contrast, collectivist cultures emphasize group harmony and collective goals, with individual achievements often seen as a result of group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As a consequence, people in individualist cultures may perceive higher levels of social mobility. Power distance might also influence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the greater the power distance, the lower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possibl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conomic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including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Lastly, current research lacks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We propose that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produces subsequent effects mainly through three pathways: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motivation, and identity.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can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and vice versa. Specifically, low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might reduce the sense of control and self-efficacy. Additionally,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might influence motivation, including approach-avoidance motivation and self-enhancement motivation. Furthermore, identity might be a mechanism for the effects of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High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might lead to subsequent effects by increasing identity conflict and identity uncertainty.

Key words social mobility, economic mobility,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equality